



蔡 昉 自选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013070613

C92-53
04



蔡昉自选集



北航

C1678156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C92-53
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昉自选集 / 蔡昉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3

(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

ISBN 978 - 7 - 80767 - 670 - 6

I. ①蔡… II. ①蔡… III. ①人口经济学 - 中国 - 文集②劳动
经济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 C 924. 2 - 53 ② F 249.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8780 号

蔡昉自选集

著 者: 蔡 昉

出 版 人: 赵建廷

责任编辑: 李慧平

助理责编: 侯轶民

装帧设计: 陈 婷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 - 4922085 (综合办)

E - mail: sx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53 千字

印 数: 1 - 3 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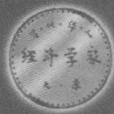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67 - 670 - 6

定 价: 25.00 元

当代
中国人
经济
学
家
文
库

主编/胡必亮 赵建廷
编委/胡必亮 赵建廷
樊 纲 黄有光
林毅夫 张 军



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与政治改革都表现出循序渐进、健康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种力量在同一时期汇聚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大舞台,为中国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并直接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新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新阶段的重大事件,并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

变革的时代必然产生创新的思想。在中国发生这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中国大陆经济学家,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学家以及旅居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共同见证和详细观察了这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变迁甚至直接参与其中,根据中国国情并参照国际经验,创立了许多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一方面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也对这一伟大实践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将这些经济学家独立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梳理清楚,并整理出来,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学界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家,也有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20世纪,山西经济出版社曾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收录了国内59位经济学家的选集,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21世纪拟出版一套《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收录全球华人中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与其他类似的图书相比,这套文库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强调理论性,即所选文章必须是理论性论文;二是强调独创性,所选论文要求理论观点鲜明,而且必须具有原创性;三是强调规范性,即所选论文的写作方式必须符合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规范。

从本文库的编辑形式来看,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首先,每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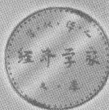
自选的论文后面都有一篇作者的自述短文或本研究领域学术权威(包括相关研究机构、学术报刊等)的评论文章,对该文的研究背景、创新意义及其学术影响做出实事求是的评论,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文章的学术价值;其次,不论作者创新的理论观点多寡,文章长短,著作厚薄,只要有五万字以上文字即可成书,重在原创性;最后,除文库主编(创意提出者与设计者)外,文库编委会成员皆由入选作者组成,为保证本文库较高的学术水准,每部候选著作都必须经编委会成员全数通过,方可入选。

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家也正逐步走向世界。我们期待着,曾经产生过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古代思想家的中华民族,也将在新的历史时代产生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经济学家。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希望,这套文库成为当代华人经济学家贡献给历史和后人的一处独特的学术风景,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繁荣与发展之大厦起到铺路石的作用。

主 编

2006 年 6 月 10 日



学术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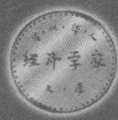
蔡昉, 1956年9月生于北京, 籍贯江西萍乡。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98年以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别获得“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等表彰。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近年获中华人口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中国软科学奖。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曾经先后三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 分别就我国就业问题和“十二五”规划等专题进行讲解。

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以及一些政府部委的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内外若干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等。曾先后多次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项目顾问。担任美国科学院项目顾问、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顾问委员会成员、世界经济论坛人口理事会成员和老龄化理事会成员、英国皇家学会人与地球工作组成员、《世界发展报告(2013)》顾问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改革开放时期的“三农”问题、劳动

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过去10年中出版著述或主编中文专著30部,个人文集8部,英文著作7部,发表中文论文数百篇,英文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等,主编《中国经济转型30年》和《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绿皮书》系列等。



自序

我是在改革开放伊始便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代幸运儿,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学术研究,涉足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等领域。我所走过的研究道路,可以概括为从农业经济学入手,进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策略问题、地区经济增长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等,着眼于探索中国摆脱贫困之路,并探索不同于西方新古典传统理论的经济学方法论,力图建造一个逻辑上一贯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

我尝试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宏观角度看待和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结合经济学和人口学理论把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融为一体,研究人口红利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估算了改革开放时期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见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及其政策含义,揭示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及相应的人口政策问题的关系,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宏观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的角度研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问题,深入到最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把人口学分析引入了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我最早撰文倡导就业优先原则,经过长期论证和广泛的讨论,最终被决策者接受并写入中央文件。根据人口转变的趋势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动态,我较早对劳动力供求形势做出了独到的判断,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虽然遭到很多批评意见,但是,现实的发展表明,这些研究对宏观和微观的长期增长战略,具有重要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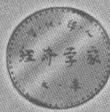
受胡必亮教授和赵建廷社长的约请,并得到本丛书其他编委的同意和鼓励,我自己选择了9篇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结成这本论文集。这些文章固然说不上如何优秀,但是,每一篇记录了我个人的连续思考

和探索，也在相关的学术和政策讨论中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从事后来看，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有针对性的，所持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甚至时至今日许多认识问题和政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还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

对于本文集的出版，在首先要感谢丛书编委胡必亮、赵建廷、樊纲、黄有光、林毅夫和张军之外，还要感谢责任编辑李慧平以及所有鼓励我、帮助我的出版社工作人员。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多年以来也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包括直接与我合作从事研究、分摊我的事务性工作，以及提供各种科研辅助工作。借此机会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妻子和孩子对我工作狂般的生活方式的容忍，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奉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蔡' and '防',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3年春于北京



目录

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	001
自述之一	014
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 经济理性	016
自述之二	030
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 就业体制转换	032
自述之三	046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048
自述之四	063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 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	065
自述之五	079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082
自述之六	099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延续	
——大国雁阵模型分析	101
自述之七	119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	
与针对性	121
自述之八	134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	
制度统筹	136
自述之九	151

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

农业发展政策是对适应特定经济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有关农业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宏观调控手段和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对每一组内生形成的制度结构来说,制度适应性是制度安排的重要含义之一,农业发展政策各个组成部分改革的不配套性必然导致农业发展中的矛盾。理解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适应性,并由此在市场经济的新的支点上选择一种内在统一的农业发展政策,是本文讨论的中心。

一、传统农业发展政策及其控制原理

我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政策是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的。

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产生了两个矛盾,一是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与当时资本稀缺状况的矛盾,一是重工业发展要求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与当时要素市场十分不发达状况的矛盾。面对这两对矛盾,实际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除了形成一套以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之外,还要建立一种能够不依赖市场机制的资源分配体制和直接的积累渠道。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宏观政策环境,是为了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其中低工资政策又需要以农产品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低价供给为条件。传统的农业发展政策便以此为逻辑起点而逐渐形成。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为了以低价掌握必要的农副产品以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需要实行了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下,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和定价都是由国家垄断的。然而,此时还不能确保农民能够完全按照政府所要求的品种和数量生产农产品,也不能保证农民将其生产要素完全有效地投入到农业

* 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1994(6)。

生产中去,因此就要求有更深入一步的制度安排,以切断生产要素的流出渠道,并可以直接贯彻国家的计划。适应这种制度需求,20世纪50年代末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农业中劳动、资本和土地被集中起来统一使用,根据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生产出的产品及其价值则按照国家征购、集体积累、社员劳动报酬这样的顺序进行分配。在该制度下由于农业生产要素受到制度约束不能自由转移,其机会成本几乎为零,报酬虽然被压到了均衡水平之下,但只要仍然为正数或大于机会成本,要素的供给量就不发生变化,一定的农产品生产及供给就可以得到保障。由此我们看到统购统销制度与人民公社体制在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相应政策环境条件下的内在统一性。

统一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下的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构成了传统农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制度结构。这种农业发展政策不仅解决了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的问题,也提供了一种强制性地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积累的方式。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传统农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是要用低于均衡水平的价格收购农产品,而达到这一点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实行农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数量控制。图1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低价数量控制的基本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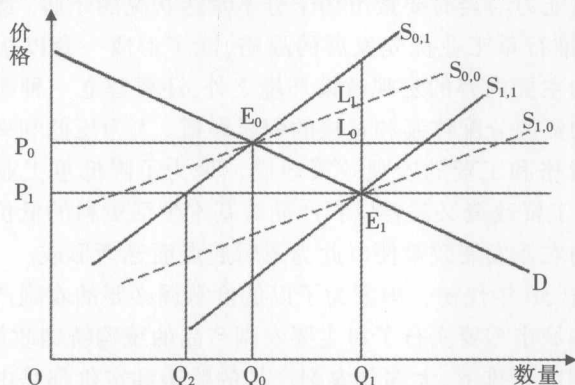


图1 农产品低价数量控制原理

我们假定图1中 P_0 和 Q_0 分别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农产品价格和数量。在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政策的情形下,收购价格被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如图中的 P_1 。在这种价格水平之下,农民所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和社会需求量就产生差别,如图中 Q_1Q_2 。由于政府的责任是保证工

业化所必需的农产品供给,所以需要借助于直接计划的办法对农产品生产实行数量控制。假设政府设定的数量控制目标为 OQ_1 ,则意味政府强制性认定农业生产者的边际成本(供给)曲线为 S_1 ,而不承认实际的边际成本线 S_0 。用这种数量控制手段,国家实现了以低价收购既定数量农产品的政策目标,但却给生产者带来了福利损失。

这个损失量就是农民根据实际的边际生产成本所不愿生产,而在政策强制下不得不在国家认定的边际成本水平上生产的两种福利效果之间的差额,表现为图中的三角形面积 $E_0E_1L_0$ 。这就是传统农业发展政策的福利效果。此外,图 1 还显示出另另一个性质。我们给出两对斜率不同的边际生产成本曲线,分别为 $S_{0,1}$ 和 $S_{1,1}$ 以及 $S_{0,0}$ 和 $S_{1,0}$ 。在较陡的一对曲线 $S_{0,1}$ 和 $S_{1,1}$ 产生差别的情况下,生产者的福利损失为较大的三角形 $E_0E_1L_1$;在较平缓的一对曲线 $S_{0,0}$ 和 $S_{1,0}$ 产生差别的情况下,生产者的福利损失为较小的三角形 $E_0E_1L_0$ 。这一性质的现实含义为,生产者生产一定产品的追加成本越高,在低价收购和数量控制的制度安排下的福利损失就越大。

二、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形态及其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针对人民公社体制下劳动激励不足、缺乏生产积极性的弊端而进行的重大改革。其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确立为起点,我国农业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向市场机制过渡。但是,传统农业发展政策是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及其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而形成的,在后者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农业中资源配置就不可能转变到完全的市场调节基础上。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农业中出现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矛盾,它们与非市场条件下的传统农业发展政策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延续性,又孕育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政策新支点的选择取向。因此,我们根据 6 个定性标志,把农业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按照三种形态的演进序列进行分析,既有利于理解当前农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也有利于明确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见表 1)。

表 1 农业市场化改革演进形态

定性标志	传统农业发展政策形态	发展政策转变形态	市场经济下农业发展政策形态
与国际市场的衔接	无	无	有
国内统一市场	无	少量	有
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强控制	双轨	放开
经济作物价格形成机制	强控制	基本放开	放开
粮食数量控制程度	强	较强	无
经济作物数量控制程度	强	较松	无

在传统农业发展政策形态下, 农业经济中基本不存在市场机制。虽然有对外贸易存在, 但国际市场状况与国内的资源配置毫不衔接; 国内省际存在着国营商业部门的农产品调拨, 但并不是以市场形式而是完全按计划方式组织的; 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价格都由国家统一制定, 并被压低到均衡水平之下; 作物的生产、种植也受到严格的数量控制。所以, 这种形态是市场化的最低级形态。如前所述, 在这种制度结构下, 农民被强制性征税, 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但对于不同地区, 农业经济的福利损失是不一样的。虽然农产品的普遍短缺是我国经济中的现实矛盾, 但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则是短缺中的要害产品, 加上缺少外部经济联系, 以及国家安全、外汇紧缺、国内运输能力弱等因素, 使得“以粮为纲”、自给自足成为传统农业发展政策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因此, 各地无论是否具有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 都被要求实现粮食的区域自给。

如图 1 所显示的, 越是具有较陡的边际成本曲线, 在低价和数量控制政策条件下的福利损失就越大。由于粮食自给政策, 各地农业生产边际成本受到粮食边际成本的极大影响。因此, 对于那些具有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地区, 农业的边际成本曲线较为平缓 (如图 1 中的 $S_{0,0}$), 在传统政策下的福利损失就较小 (三角形 $E_0E_1L_0$)。而对于那些不具有种粮比较优势的地区, 生产单位农产品的追加成本就上升更快 (供给曲线为 $S_{0,1}$), 在政策约束之下的福利损失就更大 (三角形 $E_0E_1L_1$)。根据“比较优势原则”, 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越小, 其各种产品都能满足自给自足的能力越弱或成本越高, 进行区际贸易之前贸易产

品的相对价格与贸易后的相对价格差异就越大,由贸易所获得的收益也越大^①。反过来看,对于这些小经济来说,强制实行自给自足、禁绝贸易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是很大的。把这个原理用在经济作物与粮食的关系上,我们就会看到,由于粮食是生活消费的最主要部分,所以那些在经济作物上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生产类型比之消费类型更为专业化,则在丧失贸易机会后的收益降低就更加严重。在实际执行粮食自给政策的过程中,为了操作上的必要,自给的要求就一级一级向下提出,使粮食自给自足的单位很小,造成了多重福利损失。

在农业发展政策向以市场经济为支点的政策转变阶段,市场机制对于农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这个阶段农业资源配置机制的特点是双轨并存。由于这种双轨制特征,那些在经济作物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部分地从强制性种粮食的重负之下摆脱出来,因而从刚刚起步的市场机制和区域间贸易中获益最大。这主要由两个原因形成:第一,那些具有经济作物比较优势或不具有种粮比较优势的地区,由于被提供了一定的贸易机会,以及仅在一个固定的数量上受到种植及收购的约束,因而可以把更大比例的资源分配到经济作物的生产上,并由此改变农业的边际成本曲线(使之变得平缓)。第二,由于在粮食的控制上保留更多的传统政策痕迹,而经济作物更多地受市场的调节,所以种植经济作物较之种植粮食,能够获得更符合市场均衡价格的补偿。这时,不仅具有经济作物比较优势的地区能有较大收益,就是那些在粮食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也愿意多种经济作物。

但是,归根结底,维持对粮食生产和供给的较强的数量控制,妨碍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首先,那些在经济作物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仍然要承担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责任。只有落实了中央要求的粮食种植面积之后,才能心安理得地发展经济作物^②。其次,从全国来看,农业中比较优势已经逐渐由粮食转到经济作物上,所以,继续使国内资源配置与国际市场脱钩,实行粮食自给政策,会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极大障碍,产生巨大的福利代价。图2描述了一个模型,其可能的福利效果无论对于区域自给自足还是对于全国范围的自给自足都是适

① 吉利斯(Gillis),帕金斯(Perkins),罗默(Roemer)和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发展经济学》("Economics of Development"),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第530-531页。

② 这种种植面积的要求有时以收购数量的要求间接给出。